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的 历程、成就与经验

刘海霞, 马钥钥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荒漠化防治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创性思想观点,是中国自主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重要话语表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从艰难探索与政策初制,到推进重点工程和法律保障,再到新时代全面推进荒漠化防治和民生改善,在生态系统重塑、民生经济转型、空间结构调整、制度体系完善以及文明话语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形成了将沙地治理与民生改善相结合、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参与共治、坚持重点突破与系统治理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传统经验相互支撑、以标识性治沙精神凝心聚力的宝贵经验。这既保障了中国的生态安全,同时也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新标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防沙治沙;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 D25;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1-0001-07

收稿日期: 2025-1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YJA71002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历史唯物主义蕴涵及其践行原则研究。

作者简介: 刘海霞(1971-),女,山东德州人,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马钥钥(2001-),女,山东聊城人,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荒漠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荒漠化防治是人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①防沙治沙是一项投入大、见效慢的长期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关乎国家生态安全以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防沙治沙特别是‘三北’等工程建设的决策是非常正确、极富远见的,我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②当前,学界针对中国防沙治沙的实践历程、战略选择、未来愿景等^③展开了研究,通过分析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个案总结了人与沙漠和谐共处的具体实践经验。但总体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尚未展开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防沙治沙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部生动的人与自然关系史。因此,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的历史演进、发展成就,总结其宝贵经验,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开创荒漠化防治新局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积极承担国际生态责任,立足中国土地荒漠化的基本特征与社会经济事实,深入研究土地“三化”的内在规律,通过系统科学的策略将长远目标与短期方案有机结合,在夯基垒台、重点突破中久久为功、积厚成势,创造了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奇迹。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82页。

② 《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人民日报》2023年6月7日。

③ 参见包岩峰等:《中国防沙治沙6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18年第2期;崔桂鹏等:《大国治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战略选择与未来愿景》,《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7期。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难探索与政策初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战后的荒山荒地，中国共产党初步意识到土地荒漠化的严峻形势，开始探索土地荒漠化的防治工作。1950年，政务院下设的治沙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冀西沙荒造林局、陕北防沙林场等相继建立，这些机构在各自的区域内营造了一批防护林带和耕地防风林网等，为后续防沙治沙事业的推进提供了一定的基础。1956年，在“绿化祖国”的号召下，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迎来新的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就改造沙漠和治沙科学考察问题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复电，决定于当年秋季召开治沙会议详细讨论治沙工作规划。^①次年，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西北内蒙古等六省（区）的科技工作者组建了13支综合考察队，对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地、沙漠和戈壁展开摸排和研究工作，明确了各个沙漠的特点，提出改造利用的初步意见，漫漫治沙之路由此开启。这一时期，《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发布，为防沙治沙工作提供了初步的政策支持。随后，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林业部门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在沙区开展了以植树种草、营造防护林为主的大规模群众性治沙行动，涌现了榆林女子民兵治沙连等民间治沙力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荒漠化问题，防沙治沙实践呈现出国家主导与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治理特征，其规律在于依托国家力量完成从问题识别、情况摸排到组织化推进的实践进程，以此奠定荒漠化治理的初步制度框架。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重点工程和法律保障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土地沙漠化所造成的环境退化和经济贫困，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问题之首^②。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实施的，是国家大型战略性治沙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世界级生态工程覆盖十三个省份的八大沙漠、四大沙地，规划期长达七十三年，开创了中国推进大规模生态建设重点工程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为荒漠化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20世纪90年代，随着“向沙漠进军”号召的正式发出，全国沙化土地普查工作全面铺开，荒漠化监测体系基本建立，先后出台《1991—2000年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纲要》《关于治沙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将防沙治沙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并于1996年正式参与全球荒漠生态治理，成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21世纪初，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成为世界上首个为防治荒漠化制定专门法律的国家。此后，相继发布多项重点工程规划，全面启动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草）项目、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及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重点区域速生丰产林基地构建、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设立等一系列治沙工程，开启防沙治沙工作新纪元。这一时期的防沙治沙实践呈现出工程化推进与法治化保障相互支撑的系统特征，其内在规律体现为在国家战略统摄下，通过法律体系、重点工程与监测技术的协同发展，实现治理模式由运动式、经验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转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荒漠化防治和民生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国之大者”的战略高度认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性，并就治沙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将防沙治沙与脱贫致富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得出“治沙必须治贫”“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③的重要论断。由此，防沙治沙工作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重点工程逐步推进，荒漠化、水沙化调查监测定期开展，国家林草局批复成立了“三北”工程研究院，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提高防沙治沙的效率和质量。党中央、国务院持续组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2016年6月，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后的首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发布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启动实施“一带一路”防沙治沙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彦淖尔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歼灭战、攻坚战、阻击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动员令，标志着我国防沙治沙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人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8页。

^②徐有芳：《面向21世纪的中国林业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③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183页。

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指引下，沙区干部群众利用各地的独特资源，适度发展中药材、优质牧草、经济林果、沙漠旅游等沙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了生态良好和民生改善互济的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防沙治沙工作呈现出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整体推进的特征，其规律在于以生态文明理念为价值引领，通过生态与经济目标的整合，实现治理模式从单一治理向系统治理的跃迁。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的重大成就

自然不是孤立的对象化存在，人类可以通过实践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防沙治沙既是人类认识和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实践，也是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然关系动态调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防沙治沙。”^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在生态系统重塑、民生经济转型、空间结构调整、制度体系完善及文明话语创新五个维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具有历史性、全局性和转折性的重要变革，揭示了现代中国如何通过实践探索来实现自然、社会、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内涵。

（一）生态系统重塑：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荒漠化曾长期威胁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和人民生活。20世纪70年代，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5.05%，沙化土地面积巨大，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形成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的万里风沙线，大量村庄、路渠、田园被沙侵蚀掩埋，人民群众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减。党始终将防沙治沙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持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系列重点生态工程，一茬接着一茬干，构筑起中国北疆的万里绿色屏障。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持续好转，首次实现所有调查省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逆转”，面积持续“双缩减”，程度持续“双减轻”，沙漠、沙地植被盖度和固碳能力持续“双提高”。沙区生态状况呈现“整体好转，改善加速”，荒漠生态系统呈现“功能增强，稳中向好”的态势。^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6500万亩”^③，“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显著增长，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成功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二）民生经济转型：逐步实现由因沙致贫到因沙致富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下的防沙治沙工作不仅在生态状况改善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也有力地推动了沙区民生经济的发展。我国沙漠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呈高度叠合，长期面临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困境。在防沙治沙工作系统性推进之前，沙区一度陷入“贫困—破坏土地—沙化—贫困”的恶性循环，生态退化与贫困积弊相互强化，严重制约了区域发展。随着防沙治沙工作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导向，推动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迈入良性循环。一方面，沙生植物产业成为推动绿色经济的重要抓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罗布麻、肉苁蓉等适宜沙区生长的特色植物，引导龙头企业、社会组织及农牧民广泛参与沙产业建设。在库布其，农牧民依托沙柳、甘草、胡杨等“生态—经济”双重价值突出的物种，实现了稳定收入和生活水平提升，沙漠绿洲逐步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沙漠旅游作为新兴绿色业态日益活跃，依托独特自然景观资源，沙区推动沙漠观光等服务业、沙漠公园等文化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容量，既助力地方经济增长，又提升了生态保护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效益。此外，沙区还逐步构建起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新格局。在和田县，以肉苁蓉、玫瑰花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实现规模化、链条化发展，

①《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人民日报》2023年6月7日。

②胥国盛等：《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主要结果及分析》，《林业资源管理》2023年第1期。

③关志鸥：《国务院关于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2024年11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公报》2024年第六号。

“相关合作社已达 40 余家，培育龙头企业 3 家，带动就业 1 万余人”^①，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显著增强了区域经济的韧性与协同能力。与此同时，碳汇交易的兴起也为沙区绿色就业提供了新路径，通过发展苗木等碳汇产品，实现生态价值的市场转化，不仅强化了治沙的经济动能，也拓展了居民的收入渠道。总的来说，沙区在党的领导下构建起“生态治沙+产业发展+带动增收”的融合型发展路径，逐步摆脱了生态贫困的结构性困局，转入“治沙—生态良好—增收致富—加大治沙投入”的良性循环，推动了生态脆弱区绿富同兴。

（三）空间结构调整：推动沙区从生态边缘地带向国家战略空间转变

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沙漠无用论、威胁论，认为征服沙漠难度大、经济效益低、投入成本高。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人熟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定律，从古代辉煌的楼兰文明被万顷流沙埋葬，精绝古城逐渐被历史遗忘中吸取历史教训，意识到沙漠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沙漠不但有用，更要管好用好，变废为宝。从战略储备看，沙漠与海洋都是蕴藏中国人深厚与独创思想的潜力空间^②。面对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纷争，沙漠成为涉及国家大局稳定的重要变量。相较于海洋领域来讲，沙漠领域较少有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发展沙漠产业更具自主性。1984 年，钱学森就提出遵循“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③的技术路线，发展知识密集型沙产业、草产业的理论。在多年的防沙治沙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沙区不仅是生态安全屏障，更是实现边疆稳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空间。在沙区的生产实践能够为沙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沙漠景观为核心的沙漠公园，作为一种特定的区域规划，在有效促进防沙治沙与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成为重要的宣教场所，增强了当地人民的生态认同，有利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四）制度体系完善：构建集中统一、高效协同的荒漠化生态治理格局

在长期的防沙治沙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推动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制度体系。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大规模、跨区域、可持续治理的根本保障。自“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以来，国家层面持续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统筹实施重点治理工程与区域生态规划，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和政策机制。在治理模式上，中国积极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动员群众”的协同机制，推动治理力量多元化、治理方式系统化、治理目标一体化，显著提升了资源整合能力和执行效率。在制度工具上，中国政府注重用好财政投入、生态补偿、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等多元政策工具，强化绩效评估与动态监测，确保治理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治理格局不仅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为破解“生态退化—民生困境”的难题提供了路径支撑，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引领力。

（五）文明话语创新：以东方智慧塑造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范式

中国在推进防沙治沙的过程中，立足本国国情与全球背景，积极推动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传播与制度话语的创新表达，逐步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叙事框架。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等理念为代表的中国话语，逐步嵌入全球生态治理议程，为全球荒漠化防治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范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明确指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以库布其模式为代表的沙区治理经验，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生态财富创造范式”，成功入选“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并成为巴黎气候大会的“中国样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库布其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二〇三〇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④通过举办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建设国际培训基地、分享技术与经验，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持续输出适应性强、成本低、效益高的治沙方案，推动生态合作的全球共识不断扩展。在西方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局部失效、全球南方话语表达受限的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在气候问题上频频“退群退圈”的关键时刻，中国以实践

①关俏俏：《植绿塔克拉玛干沙漠 激活沙产业潜力》，《经济参考报》2025 年 5 月 7 日。

②王文：《要海洋强国，也要沙漠强国——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调研报告》，《红旗文稿》2014 年第 1 期。

③奚启新：《钱学森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516 页。

④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 183 页。

经验塑造规则话语,以共建共享推动绿色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治理路径和思想资源,为全球沙漠生态治理开出“中国妙方”,展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觉。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防沙治沙工作的基本经验

我国作为世界上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拥有沙化土地面积 25.32 亿亩,占国土面积的 17.58%^①,“秋风吹砒田,春风吹死牛”的景象反映了沙区人民的忧患。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的需求转化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探索出一条展现中国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逐步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今后更好开展防沙治沙工作和向国际社会讲好防沙治沙中国故事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 功成必定有我: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参与共治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防沙治沙工作视为国家生态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沙漠化区域,各级党委始终将防沙治沙置于工作重心,历届领导班子接力推进,持续践行既定蓝图,从谷文昌、焦裕禄等县委书记的治沙典型,到右玉 21 任县委书记的治沙接力。历史与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防沙治沙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防沙治沙作为一项涉及生态、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长期以来遵循政府主导、企业投入、全民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其一,在政府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林业和草原局等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为防沙治沙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其二,在企业层面,在社会资本投入的有效政策与运作模式的吸引下,市场主体的活力得以有效激发,促进了生产要素向沙区流动。例如,蚂蚁金服公司的“蚂蚁森林”应用发挥了“互联网+”沙漠治理的优势,促进了植物种植、植物管护、项目监督等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增加^②,发挥了互联网时代沙漠治理工作的市场创新活力。其三,在民众参与层面,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三北”防护林等风沙危害严重区域,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参与治沙劳动,深度融入工程建设,如甘肃“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公益治沙行动,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社会参与的治理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二) 思路一变天地宽:将沙地治理与民生改善相结合

土地荒漠化不仅是生态领域的严峻挑战,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防沙治沙工作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是生存的迫切需求。荒漠化问题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人为因素,尤其是贫困问题,被视为导致土地退化为荒漠的主导诱因。因此,治沙与治贫应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非两个独立的难题。若未能将帮助荒漠化地区群众脱贫致富与防治荒漠化工作有机结合,即便国家投入巨大力量进行荒漠改造、群众教育以及惩罚破坏行为,仍可能有人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继续乱采滥伐,形成“政府积极保护,群众暗中破坏”的尴尬局面,最终导致荒漠化防治目标难以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实施生态惠民政策,引导沙区转变发展方式,逐步开展了将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相融合的尝试,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协同发展,帮助沙区群众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促进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并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多种新型农业知识密集产业——“沙产业”^③。在地方实践中,内蒙古阿拉善盟通过打造肉苁蓉、白刺锁阳、黑果枸杞“三个百万亩”林沙产业基地,使全盟近七成的牧户通过参与沙产业实现了人均年收入 3 万元至 5 万元的显著提升。^④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则大力发展沙漠旅游业,实现了“含绿量”与“含金量”的同步提升。这些都是转变思路、将沙漠视为机遇所带来的成果。

(三) 再造秀美山川:在精准把脉的基础上分类施策

从 1994 年开始,通过每 5 年一次的摸排,国家共计开展了 6 期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通过地面调

^{①④}关志鸥:《国务院关于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2024 年 11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公报》2024 年第六号。

^②王岳等:《“互联网+沙产业”:沙漠治理产业化的新探索》,《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

^③钱学森:《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农业现代化研究》1984 年第 5 期。

查、监测站监测和遥感判读基本摸清了中国的“沙情”家底。在精准把脉的基础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司针对各地差异化的气候特征、土壤类型及多元化的生态经济需求进行辨证施治,由最初的“重治轻防”到现在的“治防并重”,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类施策,探索并实施了区域化、多样化的综合性防沙治沙策略体系。其一,针对原生沙漠、沙地及戈壁等自然生态系统,实施“养”字方针。在荒漠生态系统的养护工作中,重点关注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沙漠自然公园及封禁保护区四大区域。其二,对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区域,实施“预”字方针。针对易于发生土地退化以及已显现出明显荒漠化和沙化趋势的区域,进行重点预防,采取科学管护措施。其三,对于已呈现“病态”的区域,实施“护”字方针。在荒漠化重点区域,依据《北方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科学推进治理工作,进行分类并集中连片治理,实施人工修复,以减缓其恶化程度。其四,对于具备可开发利用潜力的区域,实施“用”字方针。坚持“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的原则,加大力度开发风光电项目、工厂化设施农业、植物工厂以及光合工程等“四高”产业。此外,现阶段中国在防沙治沙领域已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依据不同的生态、地理区位特点而设计的地域性模式。如在极端干旱区域形成了敦煌模式、额济纳模式等,在干旱区域推广了民勤模式、磴口模式及二连模式等,在半干旱地区创新性地发展了榆林模式、右玉模式、塞罕坝模式等,针对高寒特殊生境探索出了共和沙珠玉模式、若尔盖模式等。

(四) 系统治理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系统观念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防沙治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荒漠化问题涉及范围广、程度复杂,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一方面,秉持“下好一盘棋”的思想,统筹规划好大系统内的各要素,“‘山水湖沙’为‘皮’,代表了土地的承载力属性;‘林田草’为‘毛’,代表了土地的生产力属性”^①,形成“皮毛”兼治的治沙体系。在“有多少汤泡多少馍”^②的水资源刚性约束下,在实践中形成了“外围封育、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全域生态治理体系,“外围封育”通过划定封禁保护区,限制人类活动对荒漠边缘地带的干扰,利用自然恢复力促进植被的再生与土壤的稳定性,遏制荒漠化的进一步蔓延。“边缘治沙”则针对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区域,采用人工干预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如设置沙障、种植耐旱植被等,减缓风沙侵蚀速度,逐步恢复土地生产力。“内建林网”是在荒漠化相对较轻的区域内,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与农田防护林建设,提升区域的水源涵养能力,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小气候,促进农业与沙地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准确把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突出治理重点,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防沙治沙重点工程。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以及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战役^③,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对西北部重点沙漠进行“锁边治理”,在兴安林海“挂斧停锯”,让广袤草原“带薪休假”,重点推进与系统治理相结合使得防沙治沙工作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五) 科技创新与传统经验相互支撑:向科技创新要答案、拜人民为师

防沙治沙工作主要聚焦于两大核心难题,一是沙面稳定性的维护,即“固沙”策略,其核心在于采用生物固沙手段;二是水量的平衡调控,即在确保植被存活的同时避免水资源过度消耗。针对这两大难题,中国历代“治沙先驱”通过长期不懈地探索与实践,在与黄沙的反复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沙经验,造就了一大批“土专家”。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沙区人民将科技创新与传统经验相结合,不断推陈出新。一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其自然、护养土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思想滋养下,借鉴中国古代“禁时”实践,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依靠土地自我恢复发展能力的“以地养地”的治沙模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另一方面,面对防沙治沙的国家需求,围绕“为绿化改造沙漠和为开发荒漠、预防可能发生的流沙危害,找寻固沙防沙措施以及确定沙漠的利用途径”^④的问题导向,中国沙漠科学在服务国家任务的过程中创建和发展起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然恢复和人工技术相结合

① 崔桂鹏等:《大国治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战略选择与未来愿景》,《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7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③ 钱贵霞等:《中国从防沙治沙到管沙用沙的演变过程与实现路径》,《应用生态学报》2024年第1期。

④ 王涛:《中国防沙治沙实践与沙漠科学发展的70年——II. 开拓篇(1)》,《中国沙漠》2023年第1期。

的可持续治沙模式。随着新一代信息科技的发展,无人机飞播造林、立式沙障扦插、立体光伏治沙等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林草新质生产力逐步形成,为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六) 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以标识性治沙精神凝心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形容防沙治沙工作是“滚石上山”,足见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持久性。防沙治沙不仅是一项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工程,更是一场考验精神意志的持久战。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沙区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深入挖掘并传承中华民族植绿护绿的传统美德,将其转化为推动防沙治沙事业的强大内生动力。在长久的实践中涌现出王有德、石光银、八步沙“六老汉”等治沙英雄,更孕育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价值的精神标识,诸如“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八步沙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等一系列标识性治沙精神。其中,塞罕坝精神也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成为新时代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开展防沙治沙工作的精神灯塔。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源整合、长期规划与社会动员方面的显著优势,不仅是对全球荒漠化治理难题的创造性回应,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成功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从“人沙对抗”到“人沙共生”理念的转变,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传统生态哲学的现代转化,为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了东方文明的思维范式。防沙治沙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大事业,面对气候变化加剧的现实挑战,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推动防沙治沙与新能源开发、碳汇交易等新兴生态领域的深度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荒漠化治理技术体系与制度框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样本。

The Cours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Leading S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Hai-xia, MA Yue-yue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opened up a road of s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work of s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rom difficult exploration and policy initial system, to promoting key projects and legal protection, and then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new era. A series of major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aspects of ecosystem remodel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spat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stitutional system improvement and civilized discourse innovation, forming a valuable experience of combining sandy land governance with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ement, whole society participating in co-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key breakthroughs and system governance, mutual support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al experience, and cohesion of the spirit of identifying sand control. It not only guarantees China's ecological security,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benchmark for global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ser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责任编辑 如初]